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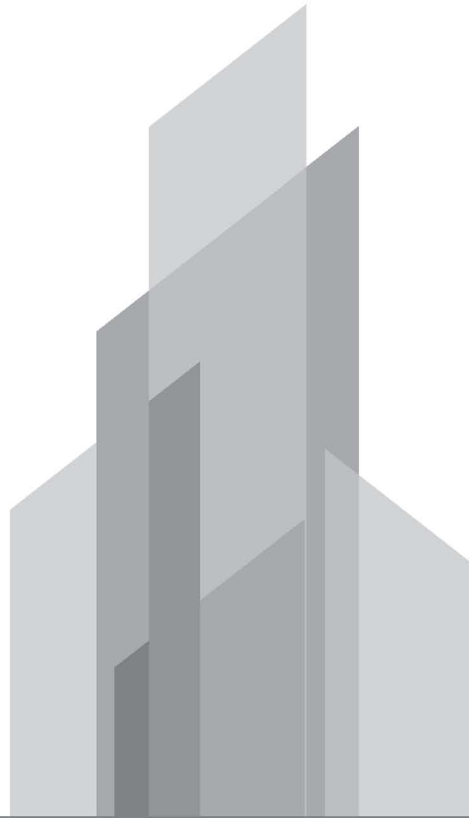
企业治理多样化研究

李少武 王 瑜 陈 羽 陈 对 编著

QIYE ZHILI
DUOYANGHUA YANJIU



四川大学出版社



李少武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组织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组织研究。

王 瑜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市场研究。

陈 羽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与理论研究。

陈 对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与理论研究。



企业治理多样化研究

— QIYE ZHILI
DUOYANGHUA YANJIU

李少武 王 瑜 陈 羽 陈 对 编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平
责任校对:周 颖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企业治理多样化研究 / 李少武等编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614-8515-6

I. ①企… II. ①李… III. ①企业管理—研究
IV. ①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2174 号

书名 企业治理多样化研究

编 著	李少武 王 瑜 陈 羽 陈 对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515-6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7.875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前 言

从理论层面上看，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研究了企业，进而探究了整个经济社会问题。在科斯开创现代企业理论之后，企业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受宠的对象之一。从实践层面上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微观层面的企业效率提升、利益冲突减少，会使得宏观层面的国家或地区社会总产出增加，进而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同时，企业需要通过构建一套治理机制和治理结构，才能实现“多赢”和“共赢”。于是，研究企业治理多样化问题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任何理论必须在“源于现实”的基础上“高于现实”。企业治理理论也必须通过理论抽象反映企业治理多样化这一不争的客观事实。不过，现代企业理论和以其为基础的四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理论并没有很好地反映企业治理多样化。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视为一个“投入—产出”最大化的“黑箱”，因而无法研究任何企业治理问题。在打开企业这一“黑箱”的同时，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基础理论没有很好地突破新古典经济学个体、最优和可逆的资源配置观。于是，在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基础理论之上构建的股东至上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基于管理的公司治理理论和基于创新的公司治理理论等四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理论，也必然难以协调市场配置和组织配置、难以统筹剩余生产和剩余分配、难以兼顾企业效率和企业权力、难以突破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

进而难以反映企业治理多样化的现实情况。

基于科斯的企业理论、团队生产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本书构建了基于企业参与者可替代程度的动态合作博弈模型和基于企业参与者可替代程度的动态合作博弈模型结构图，并得出如下两个结论：一是可以以企业参与者可替代程度，即其在市场或与其他企业参与者合作获得的收益，作为其参与企业治理的主要指标。这既强调了企业参与者的能力，又将市场视为其能力的最终评判者，还突出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在于创造更多组织租金。二是可替代程度低的企业参与者可以通过侵占可替代程度高的企业参与者利益的方式获得不当得利，在微观层面上导致企业组织租金下降和内部摩擦增加，在宏观层面上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总产出下降以及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增加。于是，需要构建一套企业治理（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机制和治理结构，使得不同可替代程度的企业参与者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以合作博弈的方式，创造并分享更多的组织租金。

在此基础上，本书分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内因分析、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外因分析和企业外部治理多样化等三个部分，以经验实证验证上述企业治理模型。从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内因来看，由于企业自身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历史演进阶段不同和企业参与者类型不同，企业各个参与者的可替代程度随之不同，企业治理也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从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外因来看，企业治理是整个社会宏观制度的一个微观反映。企业外部环境，主要是制度环境，影响了企业参与者的可替代程度，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治理结构。于是，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背景不同，往往导致后进国家盲目照搬他国成功企业治理模式的做法可能“南辕北辙”。同时，虽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治理模式不同，但是成功的企业治理模式却具有相同的“内核”，即在相对公平的前提下，企业

各个参与者基于自身可替代程度，创造和分享更多的组织租金。与此相反，在不成功的企业治理模式中，可替代程度低的企业参与者可以通过侵占可替代程度高的企业参与者利益的方式赚取“快钱”，使得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都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从企业外部治理多样化来看，市场机制、政府及其法律规范、中介机构监督和舆论机制等多样化的企业外部治理构成了企业治理的基础设施，是企业内部治理发挥作用的前提和保障。企业外部治理的作用在于重视企业各个参与者可替代程度的基础上，修正企业本身作为第二方强制性契约的内生的不公平性，进而使得企业兼顾效率和公平。

企业治理多样化的研究应该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并最终要指导和服务实践。因此，本书提出了基于企业参与者可替代程度的直接参与模式、基于企业参与者可替代程度的间接参与模式和应对不可证实性问题的企业治理模式等三种治理模式。同时，在企业自主选择治理模式和构建良好的企业外部治理这一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企业参与者通过上述企业治理模式，在动态合作博弈过程中，实现“多赢”和“共赢”的企业治理目的。

目 录

第 1 章 绪 论	(1)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5)
1.3 研究方法	(14)
1.4 研究思路和主体框架	(16)
1.5 创新点	(18)
1.6 不足之处	(20)
第 2 章 四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理论及问题的探讨	(22)
2.1 企业契约的属性	(23)
2.2 新古典经济学	(28)
2.3 团队生产理论视角下的股东至上理论	(34)
2.4 最优契约设计理论视角下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43)
2.5 科斯的企业理论、企业能力理论视角下的基于管 理的公司治理理论	(51)
2.6 企业能力理论视角下的基于创新的公司治理理论	(60)
2.7 四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理论的比较分析及其问题探究	(64)
2.8 研究企业治理理论和企业治理多样化的意义	(73)
2.9 小结	(76)

第 3 章 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及治理多样化	(78)
3.1 马克思关于企业性质的认识	(78)
3.2 马克思基于历史维度的企业治理多样化理论	(85)
3.3 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家对企业治理认识的差别	(89)
3.4 小结	(91)
第 4 章 构建企业治理的基础模型	(92)
4.1 关于企业治理模型的若干说明	(93)
4.2 基于企业参与者可替代程度的动态合作博弈模型	(100)
4.3 基于企业参与者可替代程度的动态合作博弈模型 结构图	(114)
4.4 小结	(116)
第 5 章 基于模型的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内因分析	(118)
5.1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企业治理多样化	(118)
5.2 基于企业历史演进的企业治理多样性	(131)
5.3 基于企业参与者类型的企业治理多样化	(139)
5.4 小结	(153)
第 6 章 基于模型的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外因分析	(154)
6.1 企业治理需要外部制度	(154)
6.2 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外因分析	(157)
6.3 典型的企业治理模式	(160)
6.4 典型的企业治理模式再分析	(181)
6.5 小结	(185)
第 7 章 基于模型的企业外部治理多样化分析	(187)
7.1 市场竞争机制	(188)
7.2 政府和法律规范	(190)
7.3 中介机构监督	(193)

7.4 舆论机制	(203)
7.5 小结	(206)
第8章 企业治理多样化的理论再现	(207)
8.1 企业治理多样化的目的	(207)
8.2 构建多样化的企业治理模式	(210)
8.3 企业治理多样化的过程	(217)
8.4 企业治理多样化的选择主体	(221)
8.5 构建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基础设施	(223)
8.6 小结	(225)
参考文献	(227)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在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企业是一种改进生产效率的、重要的生产组织形式，以至于到近现代成为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其他经济现象具有各自的规律性一样，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有其独特的、内在的运行规律。因此，经济学家一开始就一直在探究企业的运行规律。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探究企业，进而探究整个经济社会的问题。他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①可见，斯密主要关注的正是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比如斯密的扣针制造厂），而非社会上的劳动分工（不同的职业和工作岗位的分工）和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分工（以工资为生存基础的阶级的出现）。^②如果说斯密重点研究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及其带来的劳动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那么马克思则重点关注了分工所带来的协作，及其产生的集体生产力。马克思指出：“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

① [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Chandra R. Adam Smith, Allyn Young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04, 38 (3): 787—805.

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① 此后，马歇尔不仅关注企业内部的分工和协作，还关注企业外部的联系，并探讨了知识和组织演进等与企业密切相关的问题。自 19 世纪中期开始至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新古典经济学居于统治地位。为了抽象出系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视为一个类似于生产函数的“黑箱”，“缺乏关于工商企业的理论”。^② 不过，1937 年科斯找到了“交易费用”这一可有效地打开企业“黑箱”的“钥匙”，使得企业、组织、制度等经济现象中的关键因素可以以“成本—收益”的方式纳入经济学研究范畴之中。同时，科斯认为，与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分配资源不同，企业内部是由“企业家—协调者”的“权威”和“命令”来分配资源。与之不同，阿尔钦和德姆赛茨（1972）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在于“团队生产”和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中心签约人”。^③ 此后，交易费用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则提出了“资产专用性”这一关键性概念，进一步丰富了企业理论。正是由于包括上述经济学家在内的众多专家和学者的不断努力，企业理论才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受宠的对象之一。正如科斯指出的那样，“经济学理论在考察整个经济体系效率时，形成了从单个企业分析开始，而非以产业开始的明显的趋势”。^④ 因此，本书也试图加入这一研究行列之中，并希望“站在巨人的肩上”，从企业治理多样化的视角挖掘企业这一组织形式运行的规律。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② [美] 玛丽·奥沙利文：《公司治理百年——美国 and 德国公司治理演变》，黄一义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7 年版。

③ Alchian A, Demsetz H.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62 (5): 777—795.

④ [美] 奥利弗·E. 威廉姆森、西德尼·G. 温特：《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姚海鑫、邢源源译，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当今，四类典型的公司治理理论，即股东至上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基于管理的公司治理理论和基于创新的公司治理理论已成为主流的治理理论。不过，本书在从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基础理论——这一理论“源头”重新探究上述四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理论时发现，虽然这四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个人、可逆、最优的资源配置观，但是它们不仅各自存在理论缺陷，而且还都难以协调市场配置和组织配置、难以统筹剩余生产和剩余分配、难以兼顾企业效率和企业权力、难以突破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以及难以实现多样化治理（详见本书第1章分析）。因此，既有必要从公司治理理论延伸至企业治理理论，又有必要从公司治理理论中的公司治理单一化（现实并非如此，即公司治理理论不能很好且全面地反映现实公司治理情况）延伸到企业治理多样化。对此，本书以企业治理多样化为题，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司治理理论因其基础理论必然导致的内生性缺陷，探究企业治理的真实内核；并通过企业治理多样化在微观层面上实现企业效率和公平，在宏观层面上实现社会总产出提升和社会和谐。

此外，企业治理多样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企业治理（包括企业内部治理和企业外部治理）会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制度不断完善而日益展现出新形态。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硅谷出现了风险投资基金这一新的企业治理结构。风险投资基金本身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其中，普通合伙人具备发现具有市场潜力的企业的能力，拥有技术、管理等技能和一定数量的资金，负责基金的具体运作，承担无限责任；而有限合伙人则提供主要的资金。于是，风险投资基金能够挖掘有市场前景的、由技术专家创立的高新技术小企业，并为其提供必要的资金、管理、技术等配套服务，使之做大做强（参见本书第4章和第7章分析）。最近几年，浑水研究（Muddy

Waters Research) 和香橼研究 (Citron Research) 等做空机构 (属于信息中介机构) 成为新的企业外部治理的组织形式。这种企业外部治理的组织形式可以有效地克服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因信源的选择性编码、信道的噪声干扰和信宿本身的译码能力不足等限制, 减弱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进而可以有效地监管上市公司高层的道德风险和资本市场的逆向选择 (详见本书第 6 章分析)。对此, 本书认为有必要在探究企业治理多样化理论的同时, 尝试论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公司治理的新形式。

当然, 企业治理多样化研究应该得出规律性的结论, 并最终要指导和服务实践。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 企业的效率和公平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总产出以及和谐与稳定。对此, 本书认为有必要通过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内因研究得出, 哪些因素使得哪类企业参与者为了个人利益, 没有实现更多的组织租金, 并造成了企业分配的不公平; 以及企业如何通过治理多样化, 创造并分享更多的组织租金, 即实现“多赢”和“共赢”, 进而实现社会总产出增加和社会和谐与稳定。任何一个国家, 尤其是后进国家, 需要借鉴国外企业治理经验。不过, 后进国家往往希望照搬一套国外先进的企业治理模式, 或盲目地借鉴多国治理模式的优点, 并将其运用到本国的企业治理实践当中, 但这只能达到“南辕北辙”的效果。本书通过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外因研究得出,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以企业自主选择为主, 政府等做好基础制度建设, 进而共同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企业治理模式。同理, 企业外部治理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不过, 这种企业外部治理多样化既有前提条件的限制, 又需要相互耦合才能发挥最大效力。本书也试图在这方面给出意见。此外, 本书认为企业是一个基于各方合意的、可替代程度高的参与者服从可替代程度低的参与者的第二方强制性契约, 需要通过企业内部治理和企业外部治理共同营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 使得二者尽各自最大

的努力并通过合作生产和分享组织租金；而不是强化这种不平等关系，使得企业成为可替代程度低的参与者侵占可替代程度高的参与者的“装置”，进而陷入不合作的低水平生产“陷阱”。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在现实世界中，企业治理（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是多样化的。在企业理论的研究中，企业理论研究者必然承认这一现实。不过，在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基础理论研究中，“企业治理多样化为什么”“企业治理多样化是什么”“企业治理多样化怎么运作”（即企业治理多样化的企业治理模式）^①这三大问题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于是，基于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基础理论之上的公司治理理论也就难以回答这三个问题（关于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基础理论及其对应的四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理论之间关系的相关论述，详见本书第1章分析）。因此，本节将论述以现代企业理论中的基础理论为主的理论研究没有很好解释企业治理多样化的原因。

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希望获得一个最小的概念性工具（a minimal conceptual apparatus），从而对市场行为进行分析”^②，故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研究企业问题。在这一前提下，企业被视为一个可以使得“投入—产出”最大化的生产函数，企业治理问题无从涉及，更不用谈企业治理多样化了。

1937年，科斯以《企业的性质》一文，开创了现代企业理论。在科斯的企业理论中，企业以“企业家—协调者”的“权威”和“命令”代替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实现了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同时，科斯认为，作为管理者的“企业家—协调者”可以

① 本书第7章对上述三个问题给予了解答。

② Mas-Colell M D, Jerry R G. Microeconomic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完美地制定和执行契约，进而可以清晰地界定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可见，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视为“投入—产出”最大化的“黑箱”，科斯的企业理论既具有革命性，企业因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不能自发地实现效率最大化；又具有妥协性，企业存在一个可以无交易费用，即完美协调企业内部关系并准确确定企业 and 市场边界的“企业家—协调者”。在这种理论前提下，企业需要“企业家—协调者”通过“权威”和“命令”加以治理以便节约交易费用，却又难以深入地探讨企业治理和企业治理多样化问题，因为理论中假设“企业家—协调者”已经将企业治理问题完美解决了。在实际的运用中，科斯的企业理论也更多地用于解释企业和市场边界的（替代）问题，即所谓的企业和市场“二分法”。其中，科斯的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和市场边界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很好解释的企业纵向一体化和多角化（需要结合企业能力理论）。^① 可见，科斯的企业理论更关注于企业和市场的关系，而非企业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更难以解释且探究以企业参与者之间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企业治理多样化问题。

与科斯的企业理论不同，团队生产理论强调企业的本质不是科斯意义上的“权威”和“命令”，而是团队生产和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中心签约人”。团队生产理论不完全认同“资本强权”的观点，将资本和劳动放在对称性位置，甚至分析了工会在企业治理中的监督地位。同时，团队生产理论认为，企业参与者达成契约需要他们之间进行讨价还价，而非强势的一方强制性命令弱

^①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对于企业纵向一体化的解释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技术相互依存论，二是市场缺陷论。威廉姆森指出，技术依存的企业可以独立存在，只需要地理位置靠近就可以了（如冶炼和轧钢）；而市场缺陷论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市场完美的前提。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纵向一体化的解释受到普遍的质疑和批评。

势的另一方。从这一层面上看，团队生产理论似乎可以分析任何性质的企业及企业治理多样化问题。不过，团队生产理论认为，企业参与者有偷懒的动机，为了防止可以准确监督其他企业参与者偷懒行为的“中心签约人”自身的偷懒问题，必须给予其全部剩余索取权。这使得团队生产理论只有唯一的企业治理形式，即“中心签约人”拥有全部剩余索取权，而非“中心签约人”没有任何剩余索取权。正是由于团队生产理论的“中心签约人”观念没有顾及企业治理多样化，而导致了两方面的负面问题：一是极大地限制了团队生产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和运用范围，往往被视为只能解释抽象意义上古典企业的企业理论；二是“中心签约人”既可以准确地监督企业参与者的偷懒行为，又可以执行完美契约来监督其他企业参与者的偷懒行为。这一前提既过于苛刻，缺乏现实的解释力；又在一定程度上与团队生产理论中生产要素贡献具有不可分离性和不可相加性相矛盾。

在科斯的企业理论和团队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威廉姆森开创了交易费用理论（简称 TCE 理论），格鲁斯曼、哈特和穆尔开创了新产权学派（简称 GHM 理论）。这两个理论认可了科斯的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是一种契约和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的观点；却放弃了科斯的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是以“权威”和“命令”代替市场价格机制的观点，反而借鉴了团队生产理论中关于剩余索取权概念及其必要性的论述，将企业剩余控制权或剩余索取权给予资产专用性投资者。交易费用理论“把工商企业看作一种治理结构，而不是一个生产函数”^①，即因存在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企业被视为针对交易频率高且资产专用性程度高的交易而设计出的一种有别于市场的治理结构。同

① [美] 奥利弗·E. 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